

高启《青丘子歌》作于何年

——与傅彪强先生商榷

房 锐

(四川大学 中文系,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青丘子歌》是元末明初著名诗人高启的代表作之一。确定此诗的创作年代,对于了解高启的人生道路和思想发展轨迹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傅彪强先生认为此诗作于高启第三次隐居青丘后,但笔者在对高启诗文进行长期研读的基础上认定,此诗应作于高启第一次隐居青丘时,即元至正二十年(1360)到至正二十二年(1362)间。

关键词:高启;青丘子歌;隐居;苦吟;人生态度;思想状况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0)05-0069-05

《青丘子歌》是高启(字季迪)所作的著名七言歌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享有较高的声誉。日人近藤元粹称它“奇想自天外来,匪夷所思,有李谪仙之口吻”。“翩翩矫逸,金锵玉戛,在苏、陆以外,别开一境,元明间无复一对敌”[1](卷十一)。关于此诗的写作时间,近年学术界存在一些争议,本文拟对此问题略作辨证。

为确定《青丘子歌》的写作时间,我们可先从诗序入手。高启在诗序中说:

江上有青丘,余徙家其南,因自号青丘子。闲居无事,终日苦吟。闲作《青丘子歌》言其意,以解诗淫之嘲。[2](卷十一)

按:高启一生曾三次隐居青丘。第一次是在元至正二十年(1360)到至正二十二年(1362)张士诚政权统治期间,第二次是在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张士诚政权灭亡至明洪武二年(1369)赴京修史前,第三次是在洪武三年(1370)年

辞官归隐之后。高启的学生吕勉在《槎轩集本传》中说:

元季僚扰,张士诚据浙右,时彦皆从之,先生独弗与处,挈家依外氏,以咏歌自适,故有《青丘子歌》并《江馆》一集寓志焉。[2](附录)

依吕勉之说,此诗写于元末张士诚政权统治期间。而傅彪强先生在《高启〈青丘子歌〉作年辨正》一文中却认为,此诗应作于高启第三次隐居青丘后[3],原因之一是高启在此之前,因家境贫寒,不可能“闲居无事,终日苦吟”。“而他在洪武三年(1370)辞秩归田时,‘赐金以还’,因而隐居青丘时可以‘闲居无事,终日苦吟’”。

在笔者看来,傅先生的观点大有商榷的必要。

其一,傅先生的观点割裂了“闲居无事,终日苦吟”与高启元末创作成就之间的因果关系。其实,高启在元末的生活过得相当清闲(限于篇幅,

本文对高启第二次隐居青丘时的文学活动不予论述)。早在北郭时,在他身边就聚集着王行、徐贲、张羽、杨基、余尧臣、高逊志、唐肃等一批青年诗人。他们因志趣相投而结成诗人社团。高启在《送唐处敬序》中说:“余以无事,朝夕诸君间,或辩理诘意以资其学,或赓歌酬诗以通其志,或鼓琴瑟以宣堙滞之怀,或陈几筵以和宴乐之好,虽遭丧乱之方殷,处隐约之既久,而优游怡愉,莫不自有所得也。”[2](《凫藻集》卷二)胡翰在《岳鸣集序》中亦称高启元末和好友“倡和乎山之崖水之濫取世俗之所不好而好之,含毫伸牍,鸣声咿咿,及其得意,又自以为天下之乐举不足以易其乐焉”[4](卷四)。他们读书辩难,饮酒赋诗,豪纵自乐,生活丰富多彩。《明史·张简传》云:“当元季,浙东、西士大夫以文墨相尚,每岁必连诗社,聘一二文章巨公主之,四方名士毕至,宴赏穷日夜,诗胜者辄有厚赠。”“闲居无事”的高启和他的朋友们也热心参与。如淮南行省参政尧介喜欢附庸风雅,自号醉樵。一次聚集许多名士赋《醉樵歌》,结果张简名列第一,赠黄金一饼;高启第二,得白金三斤;杨基第三,赠一镒。这成为诗坛上的一段佳话。高启与杨基、徐贲、张羽齐名,号称“吴中四杰”,而他“才力、声调,过三人远甚”[5],为四杰中诗歌创作成就最大的一位。“吴中骚雅,实先生启之”[6](卷上)。

必须指出的是,高启之所以能在诗坛上取得较高地位,固然与他才华出众有关,但更是他潜心钻研、长期苦吟的结果。谢徽《岳鸣集序》云:“始季迪之为诗,不务同流俗,直欲趋汉、魏以还及唐诸家作者之林,每一篇出,见者传诵,名隐隐起诸公间。及游四方,不懈益勤,刮磨漱涤,日新月异,荐绅诸老,咸以为不及。”[2](《附录》)杨基《梦故人高季迪三首序》称:“季迪在吴时,每得一诗,必走以见示,得意处辄自诧不已。”[7](卷十一)吕勉《槎轩集本传》也说他“逾弱冠,日课诗五首;久而恐不精,日二首;后一首。皆工致沉著,不经人道语,然有以当乎人心,而不知手足之舞蹈也”[2](《附录》)。由此可见,在元末乱世,“闲居无事”的高启致力于诗歌创作,并从中找到了无穷的乐趣,且吟诗成癖,几达痴迷状态。

其二,傅先生的观点与高启在元末和明初的

实际生活状况不符。鲁迅先生在《隐士》一文中指出:“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屨,又那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8](223页)我们对高启写于元末的诗歌也应作如是观。尽管他家道中落,生活不太富裕,但决非如傅先生所想象的那样贫穷。他曾在《蜀山书舍记》中称自己“北郭之野有土,东里之第有书,皆先人之遗也”[2](《凫藻集》卷一)。在《出郊抵东屯五首》其一中也说:“故乡一区田,自我先人遗。赖此容我懒,不耕坐待炊。”[2](卷三)如果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很难想象他在元末能应付如此繁多的社会活动。值得一提的是,高启的岳父周仲达是青丘巨室,财产丰厚,在江边有别墅,有田地,因此,高启能“挈家依外舅周仲达居吴淞江上,歌咏终日以自适焉”[2](李志光《凫藻集本传》,见《附录》)。事实上,他在隐居青丘期间所作的《郊墅杂赋十六首》、《初开北窗晚酌》等诗就充满了“闲居无事,终日苦吟”的自得之乐。此外,傅先生还忽略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传统,即:“中国古典诗歌有一个现象,炫耀自己富贵显得俗气,而诉说自己贫穷显得清高。古人说‘诗穷而后工’,反过来可以说,工于诗者不讳言穷。不讳言穷几乎成为一种写诗的传统。”[9](117页)傅先生无视高启的实际生活状况,片面强调他家境贫寒,故其所列的论据经不起推敲,其结论自然也站不住脚。

傅先生关于明初高启因“赐金以还”,得以“闲居无事,终日苦吟”的说法显得尤为荒谬。如其所言,这笔“赐金”应足以支付高启归隐后的生活之需了。那么,高启究竟得了多少“赐金”呢?他自己没有明言,但他的好友张适却明确指出是“白金一镒”[2](《哀辞序》,见《附录》)。高启辞官时,张适正在南京任职,其说法应真实可靠。和当年高启因一首《醉樵歌》而获“白金三斤”的奖励相比,这一镒白金并不算多。又据高启《志梦》一文载,与他同时辞官的谢徽也得了“内帑白金”,但当其离开南京时,所得白金已经用完[2](《凫藻集》卷五)。可见这点“赐金”只够暂时之需,无法维持今后的生活,更不能说因为有了这点白金,高启就能够“闲居无事,终日苦吟”了。

傅先生认为,“高启作《青丘子歌》时对追求功

名和济世用世已不感兴趣,他只想做一个诗人”。对此观点,笔者深表赞同。但对傅先生得出的此诗作于洪武三年高启辞官归田后的结论却不敢苟同。在笔者看来,此诗应作于元至正二十年到至正二十二年间,《青丘子歌》本身已为我们判定其写作年代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

青丘子,癯而清,本是五云阁下之仙卿。何年降谪在世间,向人不道姓与名。蹶屣厌远游,荷锄懒躬耕。有剑任锈涩,有书任纵横。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赓。田间曳杖复带索,旁人不识笑且轻。谓是鲁迂儒,楚狂生。青丘子,闻之不介意,吟声出吻不绝咿咿鸣。朝吟忘其饥,暮吟散不平。当其苦吟时,兀兀如被醒。头发不暇栉,家事不及营。儿啼不知怜,客至不果迎。不忧回也空,不慕猗氏盈。不惭被宽褐,不羨垂华缨。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兔忙奔倾。向水际独坐,林中独行。斫元气,搜元精,造化万物难隐情。冥茫八极游心兵,坐令万象作有声。微如破悬虱,壮若屠长鲸。清同吸沆瀣,险比排峥嵘。霭霭晴云披,轧轧冻草萌。高攀天根探月窟,犀照牛渚万怪呈。妙意俄同鬼神会,佳景每与江山争。星虹助光气,烟雾滋华英。听音谐韶乐,咀味得大羹。世间无物为我娱,自出金石相轰铿。江边茅屋风雨晴,闭门睡足诗初成。叩壶自高歌,不顾俗耳惊。欲呼君山老父携诸仙所弄之长笛,和我此歌吹月明。但愁欸忽波浪起,鸟兽骇叫山摇崩。天帝闻之怒,下遣白鹤迎,不容在世作狡狴,复结飞佩还瑶京!

从诗中提供的线索可看出,此诗应作于元末。首先,它打上了元末特定的时代烙印。诗中“不问龙虎苦战斗”句的“龙虎”喻英雄豪杰,如李白《古风》之一:“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10](卷二)。“不肯掉舌下七十城”句用辩士鄙食其劝齐王降汉的典故,见《史记·淮阴侯列传》。而“龙虎苦战斗”、“掉舌下七十城”正是高启漫游吴越期间(1358—1360年)和第一次隐居青丘之时征伐四起、战事正酣、谋臣辈出的元末社会的真实写照。据史载,当时正值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在全国范

围内,割据群雄与元朝军队之间以及割据群雄内部正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效力于元室或群雄的谋臣们也在其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江浙一带,朱元璋已攻占“龙盘虎踞”的南京,派兵夺取浙东诸县。张士诚以苏州为根据地,与占据浙东的朱元璋政权相对峙。两军“相屠无虚时”[11](卷三十二《新雨山房记》),战事尤为激烈。在这“三光五岳之气乍分裂,天狼下地舐血流浑浑。鹿走秦中原,蛇斗郑国门。俎豆弃草莽,干戈歎崩奔”[2](《妨雌子歌》,卷十一)的乱世,《青丘子歌》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一时代的印记。而在洪武三年高启归隐青丘之时,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已基本稳固。尽管退居北漠的元室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元残军王保保等不时骚扰北境,四川、云南等地尚未收复,但全国范围的战事已经结束。“时清莫问英雄事,回首长烟灭去鸿”[2](《寄题安庆城楼》,卷十四),当年那些苦苦相斗的“龙虎”及其谋臣们多半灰飞烟灭,历史已翻开新的一页。显然,诗中“龙虎苦战斗”的激烈战况与“祸乱初平事休息”[2](《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卷十一)的明初现状不符。而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文人们“掉舌下七十城”、建立旷世奇勋的机遇也已不复存在。

其次,它是高启在元末人生态度和思想状况的真实反映。从“有剑任锈涩,有书任纵横。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不忧回也空,不慕猗氏盈。不惭被宽褐,不羨垂华缨。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兔忙奔倾”等句中,可看出高启洁身自好的人生态度以及对乱离之世所持的强烈批判精神。这是他对元朝不可挽回的衰运,对封建割据的实质,对腐朽黑暗的社会清醒认识的结果。与此相应,在诗中,我们看到的是诗人超脱世俗功利、狂放不羁、傲岸不屈的形象。这里已看不到诗人早年所追求的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取而代之的是人格尊严高于功名利禄,全身远害、淡泊自甘远胜效力割据群雄的现实态度。诗人抛弃渴求功业之士所津津乐道的“书剑”生活,自觉把写诗作为生命中最重要事业,并为此殚精竭虑,“朝吟忘其饥,暮吟散不平”。在寻诗觅句、自吟自答中,超越了现实的羁绊,沉浸于一个与污浊动荡的乱离之世截然不同的小而丰富、包罗万象的自我精神世界。这是才华横溢、“自负亦

复不浅”[13](甲签,卷七)的诗人所找到的最佳人生抉择,也是他这一时期思想状况和人生态度的真实写照。他在张士诚政权灭亡后不久所作的《缶鸣集序》中说:

余不幸而少有是好(指苦吟),含毫伸牍,吟声咿咿,不绝于口吻,或视为废事而丧志,然独念才疏力薄,既进不能有为于当时,退不能服勤于畎亩,与其嗜世之末利,汲汲者争骛于形势之途,顾独事此,岂不亦少愈哉?遂为之不置。[2](《凫藻集》卷三)

此序堪称《青丘子歌》的最好注脚。在杨基、徐贲、余尧臣等好友效力于割据政权之时,高启却在苦吟中找到了寄托情操、安身立命之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高启作《青丘子歌》时对追求功名和济世用世已不感兴趣,他只想做一个诗人”。需要指出的是,明初处于朱元璋高压政策之下的吴中地区,诗社瓦解,诗人多难,当年诗坛彬彬之盛的局面一去不返。高启在洪武三年辞官归隐青丘时,已是“故旧凋散,朋徒殆空”[2](《送丁至恭河南省亲序》,《凫藻集》卷二)。他再也听不到诗友们的“诗淫”之嘲了。尽管他仍然“闲居无事”,饮酒赋诗,但心中却惴惴不安,“惟恐一毫不慎,获戾于时”[2](张适《哀辞序》,见《附录》)。因此,根本不可能写出像《青丘子歌》这样漾溢着充分肯定自我、追求个性精神的浪漫主义杰作。

傅先生的失误在于,为了证明《青丘子歌》作于洪武三年高启辞官归田后,不惜“歪曲”高启在元末的思想发展状况。他特意拈出高启作于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的《赠薛相士》来说明“青年时代的高启醉心功名,有用世济世的人生理想”。然而,这一说法与诗的本意不合。《赠薛相士》全诗如下:

我少喜功名,轻事勇且狂。顾影每自奇,磊落七尺长。要将二三策,为君致时康。公卿可俯拾,岂数尚书郎?回头几何年,突兀渐老苍。始图竟无成,艰险嗟备尝。归来省昨非,我耕妇自桑。击木野田间,高歌诵虞唐。薛生远拿舟,访我南渚旁。自言解相人,视余难久藏。脑后骨已隆,眉间气初黄。我起前谢生,驰弓懒复张。请看近时人,跃马富贵场。非才冒权宠,须臾竟披猖。鼎食复鼎烹,

主父世共伤。安居保常分,为计岂不良?愿生毋多言,妄念吾已忘。[2](卷六)

从诗中可看出青年时代的高启从壮心不已到宦情全无的思想变化过程。在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时代,审时度势的诗人不愿贸然出仕,成为险恶政治的牺牲品。为此,他熄灭了济世的热情,甘于伏居田野。傅先生在其文章中故意只引用诗的前八句,这种作法显然属于误导读者,不利于人们客观公正地研究评价高启真实的思想状况。出于同样原因,傅先生引用高启《感旧酬宋军咨见寄》中“顾余虽腐儒,当年亦峥嵘。小将说诸侯,捧盘定从盟。大欲千万乘,献策登蓬瀛”[2](卷四)等六句诗,来说明“诗人建功立业、扬名人世的人生理想”,而接下来的十四句诗却被傅先生省略了:

洪澜阻川途,浮云蔽天京。终焉困泽畔,日暮吟蒿蕘。贱贫此时居,复与丧乱并。何殊九月中,严霜折枯茎。颇闻君子心,道穷贵益真。己志未获施,安用轩裳荣?所以不苟出,出则时当平。

和好友宋克一样,高启也经历了从“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的痛苦思想历程。从后六句可看出,在污浊的乱世,在对社会政治状况彻底绝望后,他一方面极力维护儒家的“君子”人格,另一方面内心仍有期待。正如他在《练圻老人农隐》中所言:“我生不愿六国印,但愿耕种二顷田。田中读书慕尧舜,坐待四海升平年。”[2](卷八)可见,正是出于对时势的准确把握,出于对短暂生命的珍惜,他选择了明哲保身、避世远祸的存生之道。而这一明智的选择,使他在数年后改朝换代的大清洗中避免了“诛夷窜斥,颠踣道路”[2](《野潜稿序》,《凫藻集》卷二)的命运。

傅先生引用《赠薛相士》、《感旧酬宋军咨见寄》等诗的目的,在于比较“《青丘子歌》所表现的人生理想与高启早年诗文中所表现的人生理想之间的关系”,并以此说明“《青丘子歌》只有作于洪武三年辞官归田后,其所抒写的人生理想才不会与此前诗作中所表现的人生理想相抵牾”。和傅先生的本意相反,我们正是从比较中看出《赠薛相士》、《感旧酬宋军咨见寄》和《青丘子歌》的思想感情是一脉相承的,它们表现了诗人对历史、现状及知识分子命运的清醒认识,对自己人生道路的理

智选择。一个简单的事实是,高启若真的“醉心功名”,执意“济世用世”、“扬名人世”,又何必不应征召、隐居避世呢?同样,傅先生认为,高启在辞官归田前,“并不满足于当一个诗人或读书人”。但事实却与此说法大相径庭。如前所言,高启一直把主要精力用于读书和诗歌创作。他抱着“厄穷

勿复叹,天欲昌吾诗”[2](《秋日山中》,卷六)的信念,放弃世俗的追求,潜心于诗歌创作,并以此“遣忧愤于两忘,置得丧于一笑”[2](《娄江吟稿序》,《凫藻集》卷三)。而“自言其作诗之憔悴专一”[13](卷八,《高青丘诗》)的《青丘子歌》正是他在元末不暇他顾的苦吟生活的形象描绘。

参考文献:

- [1](日)近藤元粹. 辑注增补高青丘全集[M]. 青木嵩山堂本.
 [2]徐澄宇,沈北宗. 高青丘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傅彪强. 高启《青丘子歌》作年辨证[J]. 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3).
 [4]胡翰. 胡仲子集[M]. 四库全书本.
 [5]李东阳. 麓堂诗话[M]. 历代诗话续编本. 北京:中华书局,1983.
 [6]文震孟. 姑苏名贤小记[M]. 心矩斋丛书本.
 [7]杨基. 眉庵集[M]. 四库全书本.
 [8]鲁迅全集:第6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9]袁行霈. 陶渊明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0]王琦. 李太白全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11]宋濂. 宋文宪公全集[M]. 四库全书本.
 [12]陈田. 明诗纪事[M]. 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1935.
 [13]赵翼. 瓯北诗话[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When Was *Qing Qiu Zi Ge* by Gao Qi Composed? ——A Discussion with Mr. Fu

FANG Rui

(Chinese Institut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Qing Qiu Zi Ge*, a famous poem composed by Gao Qi, expresses how the poet concentrated on composing poems and had no time for other things. The poem also depicts Gao Qi's uninhibited, self-conceited and proud of his talents character. Therefore to determine the time the poet composed this poem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understand Gao Qi's life and thoughts. Having done research work on Gao Qi for a long time, the author thinks the poem was composed during Zhizheng 20 and Zhizheng 22, Yuan Dynasty.

Key words: Gao Qi; *Qing Qiu Zi Ge*; a life of seclusion; persevere in his composition of poems; attitude towards life; state of mood

[责任编辑:李大明]